



《中国语学文库》 总主编：邢福义

事实挖掘与理论探索：汉语语法问题的多维思辨

Unearthing the Facts and Exploring the Theories:
Multidimensional Critical Studies on Chinese Grammar

谢晓明◎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国语学文库》

总 主 编：邢福义

副总主编：汪国胜 朱 斌

本书获教育部基本科研专项资金探索创新类项目（批准号：120002040010）

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13JJD740012）经费资助。

事实挖掘与理论探索： 汉语语法问题的多维思辨

Unearthing the Facts and Exploring the Theories:
Multidimensional Critical Studies on Chinese Grammar

谢晓明◎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事实挖掘与理论探索：汉语语法问题的多维思辨 /

谢晓明著 . —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4.12

ISBN 978-7-5100-9080-6

I . ① 事… II . ① 谢… III . ① 汉语—语法—研究

IV . ① 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6757 号

事实挖掘与理论探索：汉语语法问题的多维思辨

策划编辑 孔令钢

责任编辑 李 瑞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61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9080-6/H · 0884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总 论	/001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理论与事实的互动	/001
第二章 动词与宾语问题研究	/010
“闻”的词义发展及其与“嗅”的共时比较	/010
饮食义动词“吃”带宾情况的历史考察	/019
管控动宾超常搭配的若干句法因素	/031
论元的激活扩散过程与动宾之间的语义匹配	/040
概念整合与动宾常规关系的建立	/047
代体宾语的理解因素	/056
宾语代入现象的认知解释	/068
方式宾语的鉴定模式及其典型性	/078
工具宾语的鉴定模式及其典型性	/088
第三章 句法格式与特殊句式研究	/095
异类词联合短语研究	/095
“A 加 B”格式之考察	/108
现代汉语表人的“A 兼 B”格式	/116
“很不……”和“不很……”对形容词的量性规约	/131
表无条件让步的“说·什么”紧缩句	/143
“难怪”因果句	/152
“给”字句被动义实现的制约因素	/160

第四章 词语演化及使用情况考察	/167
“难怪”的语法化	/167
“大不了”的表达功用与演化过程	/175
假设类复句关系词语连用情况考察	/187
“的话”的话题标记功能及相关问题讨论	/198
央视栏目名的用字用语情况考察	/208
后 记	/215

第一章 总 论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理论与事实的互动^[1]

一、理论与事实

当前,中国语言学已展现出一个包括汉语汉字研究、语言理论与语言应用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外国语言研究四大分支的基本格局。^[2]四大分支都包括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学科领域。其中,属于第一分支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则是我国语言学界最为热门、最受关注、被公认为起着引领作用的领域。

对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吕叔湘先生说过一段极富启示性的话:“从事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人很多,而有成就的却并不多,为什么?有人说,跟象棋比起来,围棋易学而难精。研究现代汉语语法跟研究古代汉语语法比较,好像也有类似的情况。研究现代汉语语法无需通过文字训诂这一关,自然容易着手。可也正因为研究的对象是人人使用的现代汉语,许多语法现象已为人们所熟悉,要是没有一点敏锐的眼光,是不容易写出出色的文章来的。”^[3]吕先生的这段话,说理浅白而内涵丰富。他是想告诉我们,参与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很容易,但要研究好,是有难度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敏锐的眼光。那么眼光要投向何处?如何才能造就眼光的敏锐?理论与事实怎样才能相互驱动?没有理论的牵引,对事实的描写和解释便无从下手,或者只能盲目进行。反过来说,理论的生命力由事实所赋予,理论或者来自对事实的发掘,或者通过事实的检验得到确认,或者通过事实的不断发掘与检验而越发坚挺。因此,两者的良性互动,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的永恒主题。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工

[1] 本文为2011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组织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的发言。谢晓明撰写初稿,邢福义做了增删。宋晖博士提出过宝贵意见,特此道谢。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组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3] 吕叔湘:《语法问题探讨集·序》,载邢福义:《语法问题探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必须同时把眼光投向理论与事实，通过对理论与事实的研究，培养眼光的敏锐性和透视力。

从源流上看，事实是源，理论是流。同样的事实，可以有这样那样的理论。不管采用什么样的理论，首先都必须面对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务实”为基点。对于“实事求是”，吕叔湘先生做过很好的解释。他说：“以研究工作而论，‘实事’就是要掌握材料，材料要可靠，并且要尽可能全面……‘求是’就是找出规律……‘求是’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有的同志做工作急于求成，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灵机一动，‘如此这般’，很快就有了结论。遇到不符合他的结论的事实就想设法把它解释掉，不愿意修改他的结论。这样‘求’出来的‘是’就靠不住了。归总一句话，‘实事求是’四个字看似容易实则艰辛，在实际工作中时刻想到它是有好处的。”^[1]

二、历史脚印：从马建忠到朱德熙

我国的汉语语法研究，从来以事实为本。《马氏文通》于1898年问世，成就了作为一门科学的汉语语法学的第一个篇章。《马氏文通》之前的汉语语法研究，主要范围是一些虚词和若干句式，立足于学以致用，力求弄清楚相关的规律，以便准确理解古人著述。做出贡献的学者，在几部已经问世的汉语语法学史中都已有所记录，不再赘述。这里需要特别提出定居于国内的、具有划时代性的五位学者，略加评说，以便传承我们的优良传统。他们是：马建忠、黎锦熙、王力、吕叔湘、朱德熙。

（一）马建忠

马建忠（1844—1900），其《马氏文通》，用例引自先秦两汉的古文，但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后序”中，马氏写道：“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2]“例言”中，马氏写道：“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3]可知，此书的写法，是借用西方的“规矩”；此书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的教育；此书的学术观点，则着重强调了“句读”在汉语语法中的重要地位。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

[1] 吕叔湘：《在首届青年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

[2]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页

[3]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页。

马氏不可能达到他的目的,实现他的追求,充分发挥自己的理念,然而,他的“曲证繁引”,他的许多论说,包括句子的分类、特定句式的构成状态、虚字的使用等,都表明了他是十分“务实”的,是两只脚站到了中华文化的大地之上的。

(二) 黎锦熙

黎锦熙(1890—1978),在汉语言文字研究、教学与相关工作上有多方面的突出贡献。其《新著国语文法》(1924),以西方“纳氏文法”为主要蓝本,通过对白话文的深入分析与思考,创建了一个“句本位”的语法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句本位”系统的厘定与阐述尽管存在严重的缺失,但“句本位”的提出,却说明了黎氏充分重视汉语语法不同于形态丰富的西方语法的特点。这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一大飞跃。从具体问题看,黎氏提出了相当多的论断,都是脚踏实地研究汉语的成果。比如关于“双宾语”,黎氏指出:“有一种外动词,表示人与人之间(或者人格化的事物之间)交接一种事物的,如‘送’、‘寄’、‘赠’、‘给’、‘赏’、‘教授’、‘吩咐’等,带两个名词作宾语,叫作‘双宾语’。”^[1]他关于“双宾语”的论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另外,即使是现今已经无人过问的图解法,其实还是存在许多令人得到启示的合理因素,浸透了黎氏的心血。诚然,黎氏是继马建忠之后努力揭示汉语语法特点的一位大师,他的著作充分显示了他的“务实”精神。

(三) 王力

王力(1900—1986),在多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一位语言学大师。就汉语语法研究而论,他在“语法革新”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语法研究,曾受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珀森(Otto Jespersen)《语法哲学》中所提学说的影响,但是,他所关注的,他所系念的,是要研究汉语的特点。1936年1月,他发表论文《中国文法学初探》,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对于某一族语的文法的研究,不难把另一族语相比较以证明其相同之点,而难在就本族语里寻求其与世界诸族语相异之点……此后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在乎努力寻求中国文法的特点。”^[2]后来,他相继推出《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以及《中国语法纲要》(1946)等著作,以《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建构出了富有自我特色的汉语语法体系。王力先生一贯主张语言研究应以占有广博的语言材料为基础,他在黎锦熙

[1]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5页。

[2] 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载《清华学报》1936年11卷第1期;《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24—374页。

先生提出的“例不十，不立法”^[1]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例外不十，法不破”^[2]的研究原则。王力先生不仅毕生探求汉语语法的特点，毕生探索研究方法与研究道路，特别可贵的是，他能够从语言运用的客观实际出发，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断提升自己的认识高度。其心胸之开阔，令人敬佩。

(四) 吕叔湘

吕叔湘(1904—1998)，在汉语语法研究上最有威望的一位统帅式巨匠。1942年出版的《中国文法要略》，是吕先生学术成就的第一个高峰；1979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吕先生学术成就的第二个高峰。吕先生早年受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珀森(Otto Jespersen)和法国语言学家勃吕诺(Ferdinand Bnmot)的影响，后来，一直到晚年，都在持续关注国外理论的发展，但是，不管是他的著作还是论文，都始终坚定不移地立足于汉语事实。大半个世纪里，吕先生为我们举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务实”两个大字。只要有机会，他就讲“务实”。1980年10月，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吕先生做了《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的报告，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论述“虚和实”的关系^[3]；在大会闭幕词中，吕先生指出：“语言学是一门科学，在科学面前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地去工作，反对浮夸的学风。”^[4]1981年5月，吕先生在第一次语法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都作了讲话，后来统成《扎扎实实地做好语法研究》一文。^[5]1984年，吕先生为《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5周年题词：“务实”^[6]。1992年11月，在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吕先生说：“元任先生的学问广博，这是无人敢否认的。最叫人佩服的是他写的文章无一篇不实实在在，毫无故弄玄虚的东西。”^[7]“务实”，反映出吕先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富于远见的优良学风，具有很强的矫风针对性，包含有实与虚合理结合的内核，充分重视研究工作中各个方面的辩证关系，对于我国语法研究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起着战略性的导向作用。^[8]吕叔湘先生晚年把他自

[1]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原序》，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 王力：《汉语史稿》（重排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3页。

[3] 吕叔湘：《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载《中国语文》1981年第1期。

[4] 吕叔湘：《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闭幕词》，载《中国语文》1981年第1期。

[5] 吕叔湘：《扎扎实实地做好语法研究》，载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研究和探索（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6] 吕叔湘：《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3期。

[7] 袁毓林：《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在清华大学举行》，载《中国语文》1993年第1期。

[8] 邢福义：《治学之道 学风先导》，载《世界汉语教学》1993年第4期。

己的治学原则总结为“广搜事例、归纳条理，反对摭拾新奇、游谈无根”^[1]。吕先生的治学风范，在大家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

(五) 朱德熙

朱德熙(1920—1992)，我国思想最活跃、最富创造精神的语法大家。他的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为汉语语法研究开辟了一条贯通共时和历时的路子，使汉语语法研究走上了全方位、多视角的道路。^[2]朱先生一方面重视吸取国外新的语法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又善于用汉语语言事实来检验并改进这些理论和方法，从而写出切合汉语实际的高质量的著作和论文。举两个相关的例子。一个例子是，马庆株先生回忆跟朱先生读研究生时，朱先生与他的一段谈话。在《我的导师朱德熙先生》一文中，马先生写道：“我交的第一篇文章空谈理论，先生说：‘要务实。理论来自实践，你还没有研究的实践，怎么能写得好理论文章？要关心、注意理论问题，但现在不能搞理论。’”^[3]另一个例子是，鲁国尧先生回忆朱先生给他的一封信。朱先生晚年讲学美国，他在写给鲁国尧先生的一封信中说：“研究语音史，自然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根本道理还是那些，近年来虽不乏新著，但都不易读，而且其中如有新理论，亦未经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最后能不能成立还很难说……我看主要精力和时间仍应放在语言事实的搜集和分析上。近年来，美国语言学有重理论轻事实的弊病，而且不独语言学，经济学甚至物理学亦有类似的情形。”^[4]可见，说到底，朱先生是把语言事实放在第一位的。朱先生表现出了一位大家的清醒的头脑。

三、面向未来：论实互动的几点思考

促进研究工作的论实互动，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以下几点，特别值得思考。

(一)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是永远正确的一条原则

其中的“今”和“中”，指的是“当今中国”。从古代承传下来的理论也好，从外洋引移而来的理论也好，都必须统一到服务于当今中国的应用实践上面来。两者的靠近、沟通和结合，也许能开启出一个新的局面。当今中国的语言应用实践，主要包括三大方面：a. 本国语言教育的应用实践，对象是本国学生和本国人；b. 对

[1] 《吕叔湘先生生平》，载《中国语文》1998年第3期。

[2] 袁毓林：《朱德熙先生评传》，载袁毓林编：《朱德熙选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马庆株：《我的导师朱德熙先生》，载《语文建设》1994年第2期。

[4] 鲁国尧：《重温朱德熙先生的教导——为纪念朱德熙先生逝世十周年而作》，载《语文研究》2002年第4期。

外汉语教学的应用实践，对象是外国学生和外国人；c. 计算机信息处理的应用实践，对象是需要掌握语言规则的计算机。目前，我国国学中的有关理论也好，我国语言学术刊物上成了主流的理论也好，跟我国语言应用的三大实践都存在衔接不上或者衔接不紧的问题。

（二）必须加强理论建树

缺乏理论的学科，不是坚挺的学科。现代汉语语法学目前缺少形成体系的较为成熟的理论，弱点十分明显。

理论创新的核心问题，是理论的本土化。理论的本土化包括外来理论的本土化和本土理论的提出与完善两大方面。

一方面，对国外语言学理论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引进工作，在引进的同时注意结合汉语事实来进行研究，使外来理论在汉语土壤里生根发芽，不断完善，逐渐成为能真正解决汉语语言事实的本土化理论。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国内汉语研究主要借鉴了国外形式语法、功能语法以及认知语法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看起来很丰硕，但是不少文章像贴标签一样，什么流行就一窝蜂地去做什么，真正有价值的理论构建很少，主要是用时髦新理论重新解释一些以往解释过的东西，对汉语研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此，如何加强外来理论的本土化工作应该引起整个汉语学界的重视。

另一方面，汉语学界还需要加强理论意识和自信，不断提出和完善本土理论。汉语学界一直以来对语言事实的发掘非常重视，对理论的探索、归纳与升华的工作相对而言做得较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缺乏理论意识和理论勇气有关。和事实描写相比，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不仅要语言事实进行仔细的观察和积累，而且需要进行抽象的概括和统摄大局的规律性抽绎，这就对研究者的研究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满足于只引进和介绍国外理论，停留在“国外理论+汉语例子”上面。

（三）必须处理好事实发掘与理论创新的关系

我们既要反对唯理论，也要反对唯实论。唯理论者片面追求理论创新，不愿花力气发掘事实，在进行理论建树时，对明明同理论相悖的反例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唯实论者认为理论是虚幻的东西，对理论不屑一顾。真正适合于我国语言文字的理论，最终只能产生在我国语言文字事实的沃土之上。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理论创新与事实发掘是辩证统一的源流关系，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在汉语事实的发掘过程中，我们既要注意发掘显性的语言事实，更要注意发掘隐性的语言事实。我们虽然已经弄清楚了一些汉语事实，但是还有许多汉语事实我们还没有认识清楚甚至还根本没有注意到。汉语事实的发掘工作不是已经做得很

好了,而是还远远不足。这种不足已经受到了来自理论和应用两大方面的严峻挑战。就理论而言,因为事实发掘不够,制约了外来理论与汉语事实的有效结合和本土化的进程;就应用而言,也是因为事实发掘不够,目前汉语研究的成果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语言教学、汉语国际传播、中文信息处理等方面需要。而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应用,汉语研究也不应例外。因此,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重视事实发掘。深化事实发掘就是要“从众多的事实中发掘出值得研究的事实,从值得研究的事实中发掘出规律性,从所得的规律中发掘出理论问题,总结出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可以认为,汉语事实的发掘,是汉语研究的根基”^[1]。

(四) 必须处理好外来理论引进与汉化的关系

西方语言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特色鲜明的学派,拥有明确、系统的指导思想。百余年来,没有外来理论的引进,便没有中国语言学的今天。对外来理论,我们永远尊重和欢迎。国外理论的“引进”和“汉化”,“引进”是先行阶段,重点在于把国外理论应用于汉语研究,举出若干汉语例子来进行演绎;而“汉化”,就是外来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是后续阶段,重点在于让国外理论在汉语事实中定根生发,使国外理论融入汉语研究的整体需求,从而建立起适合于汉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两个阶段都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外来理论的汉化工作,多研究一些汉语的实际问题。如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已经有了一支庞大的队伍,但是,我们对现代汉语的了解程度还很不够,一些习以为常的语言现象我们常常不知道该如何去分析解说。比如,很简单的“数量词”(或叫“数量结构”、“数量短语”),我们完全弄清楚了没有?请看这样的例子:

(1) 这一来,已有五七三十五柄长剑脱手。(金庸《神雕侠侣》第三回)

(2) 伯父能一口气喊出满汉全席八八六十四道菜肴的名字。(尤凤伟《金龟》)

如果说“三十五柄”和“六十四道”是“数词+量词”,好解释。然而,上例是“五七三十五柄”和“八八六十四道”,数词部分分别为“五七三十五”和“八八六十四”,已经是数词串了。这样的数词串是先用乘法然后说出总数。可是,从语法上说,它们的结构关系是什么?再看这个例子:

(3) 杨过毫不容情,着着进逼,片刻之间,已连刺二九一十八剑。(金庸《神雕侠侣》第九回)

这里的数词串是“二九一十八(剑)”。为什么不说“二九十八(剑)”?汉语里常用“四字格”,这类数词串里却必须是“五字格”,那么,有没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挖掘出来?诚然,对汉语语言事实的追踪和深掘,会从理论上加深对汉语语法的了解。

[1] 邢福义:《我的治学经历与心迹》,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五）必须处理好理论传承与推陈出新的关系

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包打天下，随着语言事实的不断挖掘，一些语言理论的假设很容易被证伪。今天的理论说来还头头是道，明天遇到反证时就会被一套新理论取而代之，让人觉得好像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实际上，理论的嬗变是一种常态，我们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理论要传承，但不要故步自封、墨守成规，而是要不断推陈出新，这样才能让理论永葆青春，更加贴近语言事实。比如“永远”这个词，各种词典上都标注为副词。然而，深入发掘语言事实，就可以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例如：

（4）在地震灾害中，地处深山峡谷地带的北川县城被夷为平地，1万多人不幸遇难。这成为总理心中永远的痛。（《人民日报》2011年5月11日）

（5）远征军广大官兵为捍卫民族尊严与人类和平而舍生忘死的献身精神，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永远的精神财富。（《人民日报》2011年5月13日）

（6）爱心奉献在岗位，诚心服务到永远。（《人民日报》2010年8月11日）

（7）您高尚的情操、亲切的教诲、创立的伟业，是我们最好的遗产。我们儿孙将继续继承您的遗志，踏着您的足迹，一直走到永远永远。（《人民日报》2011年3月23日）这里出现的“永远”也是副词吗？应该用什么态度和方法来应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呢？

（六）必须自强自立，重视本土理论的建树

自强自立，是指不依成法，自力更生，自我创造。现代汉语研究，仅就语法而言，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理论流派，距离真正成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说，引进外来理论是发展的必要过程，那么创建本土理论便是发展的终极目标。中国语言学要真正做到同国际接轨，必须要能够跟国外理论平等对视，不能引进、引进、再引进，一味跟着跑，永远处于附庸地位。我们要有创建理论的学术自信，不能一提到理论就想到国外，一提到本土理论就显得不屑一顾。“只有一方面重视‘引进提高’，一方面重视‘自强自立’，二者相互补足，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我们的语言学科才能真正发展起来。”^[1]

（七）必须注意借鉴与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我们在理论创新的同时，还要注意研究手段和方法的不断创新，科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和分析手段的不断改进与提高。语言研究不仅要实现语言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研究的紧密结合，更要实现语言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有机结合，充分利用各个学科的先进成果，为语言研究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新的手段、新的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科之间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

[1] 邢福义：《语言学科发展三互补》，载《汉语学报》2005年第2期。

哲学、数理逻辑、统计分析、认知学科、心理科学、计算机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现在都已经运用到语言研究中，而学科交叉必然会创建出一些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这些研究手段和方法必将为事实发掘和理论创新开辟广阔的前景。

四、结 语

加强事实发掘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这是现代汉语研究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其结果，必能形成“务实创新”的大好局面，必能促进学术流派的形成。学术流派的形成，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a. 开辟了富有特色的学术领地，有自己的“特区”；b. 提出了标志性的理论，有自己成套的研究方法；c. 显示了鲜明的治学特点，有上传下承并且日益壮大的穿越不同时期的学者队伍。现代汉语研究的深入，特别需要出现不同的学术派别。只要形成这样那样的学术派别，现代汉语研究一定会出现更加繁荣的局面。当然，学派的形成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经历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一辈接一辈的学者做坚持不懈的努力。只要汉语学界能够坚持正确的走向，现代中国语言学流派就一定会出现，现代汉语学也一定会在世界语言学研究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近来，有个在汉语语法研究上已经“占领了理论的制高点”的说法。对于这一说法，仍然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并不那么轻而易举。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制高点，要受到具体环境的制约。在甲环境中可以“致胜”，在乙环境中却可能“致败”。请看《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中的一段描述：

却说马谡、王平二人兵到街亭，看了地势。马谡笑曰：“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处，魏兵如何敢来！”王平曰：“虽然魏兵不敢来，可就此五路总口下寨；却令军士伐木为栅，以图久计。”谡曰：“当道岂是下寨之地？此处侧边一山，四面皆不相连，且树木极广，此乃天赐之险也：可就山上屯军。”平曰：“参军差矣。若屯兵当道，筑起城垣，贼兵总有十万，不能偷过；今若弃此要路，屯兵于山上，倘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将何策保之？”谡大笑曰：“汝真女子之见！兵法云：凭高视下，势如破竹。若魏兵到来，吾教他片甲不回！”平曰：“吾累随丞相经阵，每到之处，丞相尽意指教。今观此山，乃绝地也：若魏兵断我汲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矣。”

马谡拒谏失街亭，终于导致了孔明挥泪斩马谡。马谡的悲剧，就在于他自以为是，他所认定的“制高点”恰恰成为他的“致败点”。从这个小故事，我们也许可以得到某种启示！

（本文原刊于《汉语学报》2013年第3期，署名：邢福义、谢晓明）

第二章 动词与宾语问题研究

“闻”的词义发展及其与“嗅”的共时比较

一、关于“闻”的词义的已有研究

关于“闻”的词义，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了很多探讨。张永言（1960）认为，“‘闻’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是‘听到’或‘听见’，这从字形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到了现代汉语里，‘闻’却只有‘嗅’的意思，词义从听觉方面转移到嗅觉方面来了”。张文认为“闻”嗅觉义的产生不是在六朝，而是在西汉。张永言（1962）认为，“很难说‘闻’的听觉义和嗅觉义究竟孰先孰后，至少不能说后者是晚起的新义”，并对“闻”的这一词义现象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闻’的意义最初兼包听觉和嗅觉两方面，以后才专用于听觉方面……再后来又从听觉转到嗅觉……中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二，在近代以前，‘闻’的听觉义和嗅觉义之间的关系乃是一种共时的交替而非历史的演变。”“第三，指听觉的‘闻’和指嗅觉的‘闻’来源不同。”傅东华（1962）认为“‘闻’字始终都‘兼包听觉和嗅觉两方面’”，并逐一否定了张永言提出的三种解释。殷孟伦（1962）也比较细致地论述了“闻”的听觉义和嗅觉义的关系，认为“闻”先是表听觉，然后在运用过程中“派生出‘知道’、‘传到’、‘达到’等意义。至于转用而为嗅觉义，是较为后起的事了”。洪成玉（1989）认为“闻”的初义兼上达、闻知两义，感知声音、气味、事理等意义，是从闻知引申出来的。

以上研究主要讨论了“闻”的听觉义和嗅觉义的来源和关系，但各家的观点并不一致，见解歧出。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闻”的词义发展做进一步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区分现代汉语中两个嗅觉动词——“闻”与“嗅”。

二、“闻”的词义发展

(一)“闻”的听觉义及其发展

罗书肆(1984)指出“闻”本义是“听见,听到”,他调查了“闻”在《论语》和《孟子》中的使用情况。在《论语》中,“闻”出现了58次,作“听到”解48次。在《孟子》中,“闻”出现了85次,作“听到”解79次。从统计数据看,《论语》和《孟子》两书中,“闻”出现了143次,其中作“听到”解有127次。可见,先秦时期,“闻”的“听到”义是其基本义,最为常用。在魏晋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内,“闻”主要表示“听到”这一感知的状态,表示“听”这种具体动作行为的动词一般用“听”,“听”与“闻”严格区分。例如:

(1)光曜不得闻,而孰视其状貌,窅然空然,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也。(《庄子》)

魏晋以后,“闻”用于表示感知气味的用法渐趋普遍,表示“听到”这种感知状态的词除了“闻”之外,还有“听得”和“闻得”。(洪成玉,1989)例如:

(2)听得歌声人尽笑,夜头旗帜晓头催。(崔致远《月颠》)

(3)子胥闻得此语,便与渔人看船。(《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

这表明“闻”从魏晋开始就和“听”一样,可以用来表示“听”这种具体的动作行为。

虽然“听得”、“闻得”都可以用来表示“听到”这种感知状态,但用例仍以“闻”为主。例如:

(4)常闻百鸟啼鸣,求归心切。(《花间集新注》)

(5)时太守死女闻琴声哀怨,起尸听之,来于景伯船外,发弄钗钏。(《敦煌变文集·搜神记一卷》)

(6)视之不睹其体,听之不闻其声。(《敦煌文集·降魔变文一卷》)

以上几例表明,唐五代时期“听”与“闻”的区分仍很严格。

宋元时期,“听得”与“闻得”的出现频率开始大增。《三朝北盟会编》中“听得”出现4例,“闻得”出现8例。《张协状元》中“听得”出现了14例,“闻得”出现了4例,而单音词“闻”表示“听到”仅出现3例。例如:

(7)使副答云:“来时听得契丹旧酋在沙漠,已曾遣人马追赶,次第终须捉得。”(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

(8)某等答云:“韩世忠是淮南宣抚,闻得境上有军马,是他职事,不得不自为备。”(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

(9)极目荒郊无旅店,只听得流水潺潺。(南宋戏文《张协状元》)

(10)老夫闻得那张解元漾了浑家,要去赴试。(南宋戏文《张协状元》)

这一时期，“听到”之义一般不再使用单音动词“闻”表达，而用“听得”、“闻得”。《张协状元》中，“听得”的用例已经大大超过了“闻得”。可见“闻”虽然可用来表示“听”这一动作行为本身，但在与“听”的竞争中已渐处劣势。（徐俊霞，2003）

明清时期，“闻”的听觉义有进一步从“闻”的词义系统中消失的趋势。《金瓶梅》中“听得”出现了39例，“闻得”出现了15例。《清平山堂话本》中“听得”出现了71例，“闻得”只出现了1例。《杨家将》中“听得”共出现了44例，“闻得”只出现了4例。《孽海花》中“听得”共出现了34例，“闻得”只出现了6例。“闻”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虽仍可用来表示“听到”之义，但主要用于仿古语句中。

（二）“闻”的嗅觉义及其变化

张舜徽（1983）的《说文解字约注》认为“闻”的本义应为“知”，兼有知声音和知气味两义。洪成玉（1989）认为张文的看法不仅得《说文解字》训“闻”为“知闻”的真意，而且还以“知”为经，疏通了“闻”的听觉义和嗅觉义的关系。

“闻”表嗅觉义从先秦开始就已存在。例如：

（11）王强问之，对曰：“顷尝言恶闻王臭。”（《韩非子·内储说下》）

（12）龚王驾而往视之，人幄中，闻酒臭而还。（《吕氏春秋·权勋》）

但是这一时期的动词“闻”，主要表示一种嗅觉感知状态“闻到”，而不表具体动作，用于表示具体动作行为的嗅觉动词一般用“嗅”。

徐俊霞（2003）认为，表示“闻到”这种感知状态的“闻”和表示动作行为本身的“嗅”长期并存，直到元明时期，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例如：

（13）狗子闻得又香又软，做两口吃了，先摆番两个狗子。（冯梦龙《喻世明言》）

（14）不语不言，闻着酒只推瞌睡，枉了降贼见识。（王实甫《西厢记》）

例（13）的“闻”后可以带上结构助词“得”和补语成分“又香又软”，表明“闻”是一种动作行为；例（14）的“闻”后可以带动态助词“着”，表示“闻”作为一种动作行为可以持续。这两例中的“闻”都是用来表示“嗅”这种动作行为的。

从宋元开始，随着“闻”可以用来表示“嗅”这一动作义，动词“嗅”的用例开始逐渐减少，“闻”开始逐渐取代“嗅”而成为嗅觉动词的核心词。不过“闻”表示“闻到”这种感知状态的用例仍比表示具体动作行为的用例要多。据徐俊霞（2003）的统计，《西厢记》中，“闻”表示嗅觉动作的有2例，表示闻到这种感知状态的有3例。

明代开始，“闻”用来表示嗅觉动作的用法在文献中已经比较普遍。例如：

（15）众僧都闻不得那臭，个个道“善哉！”（施耐庵《水浒传》）